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0

書院教育與

科舉關係研究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兵◎著

明研究叢書 20

書院教育與

科舉關係研究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兵◎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 李兵著
--初版二刷--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9 [民 98]
470 面；15 * 21 公分。(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0)
含名詞索引及人名索引
ISBN: 978-986-00-0838-8 (平裝)

1. 書院 - 中國 - 歷史
2. 科舉 - 歷史

525.99

94006007

統一編號 1009400963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0 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著 者：李兵
策 劃 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 版 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 行 人：李嗣涔
發 行 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法律顧問：賴文智律師
展 售 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責任編輯：魏千鈞
出版時間：2009 年 4 月初版二刷
定 價：新臺幣 550 元整

GPN: 1009400963

ISBN: 978-986-00-0838-8 (平裝)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在中國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書院與科舉是兩個相當獨特的方面。

書院與科舉互相聯繫又互有區別。書院是有形的，科舉是無形的；書院給人的印象多是建築，科舉給人的印象多是制度。書院也有無形的制度，但不是最主要的特徵；科舉也有有形的考場，但至今多已灰飛煙滅。書院與科舉在 20 世紀初都被看成落後守舊的東西而為人們所否定，但書院在當代的形象已趨正面，而科舉在當代的印象還是負面。

過去多數學者都認為書院與科舉的關係是疏離的，或者說書院具有反科舉的傳統，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已開始動搖這一定論。書院是宋明儒學的策源地和大本營，理學作為宋以後儒家學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十分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書院生存的科舉時代，士人反對科舉只能居於修身齊家的層次，很難達致治國境界，更遑論實現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數書院教育家也是深明此理的，因此他們本人積極爭取應舉入仕，而且不反對書院學生應舉入仕，主要是勸導學生要學問、舉業並重。正如最著名的書院教育家朱熹所說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朱子語類·力行》）反對科舉在當時既不合時宜、也不現實。如果能夠應舉入仕，具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之後，往往反而可以獲得更好的宣傳自己學說的機會和條件。朱熹、陸九淵、湛若水、王守仁等都是考上進士之後，纔有較好的學術和政治資本建立或修復書院，進行講學佈道。因此，書院治學與應舉入仕有對立的一面，也

有統一的一面。

自古以來，中國士人就一直在思考和處理「學」與「仕」的關係，最初的說法是《論語》中子夏所說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對這句名言有許多的解釋，我的看法為：就從政的人而言，當然是以仕為本，就治學的人來說，則是以學為本，以仕為末。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種歷史現象，即除少數文學家以外，中國古代著名學者或學術大師多數是為官者，甚至是當大官者。擔任一定的行政職務，有可能獲得較多的學術資源和社會資源。由於生活中總可能遇到一類小人，為官至少可以不受小人壓制，自己的命運不至於掌握在他人手中，纔較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因此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做大學問往往需要學與仕結合。但重要的是不能忘記，學是目的，仕是手段。官員可以學優則仕，學者對仕則應抱著「以官助學」的態度。即使是仕學相兼或仕學相長，也別忘了仕而優是為了學，學是根本，不要一當了點官就樂不思蜀，樂而忘返，以至本末倒置。「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治學的快樂是更純粹更久遠的，學問的生命力也比權勢久遠。政治家在當時當地影響力一般比學者大，然而從長遠來看，往往是學者更能被後人所記得。韓愈、蘇軾、朱熹在他們生活的年代仕途不如許多高官，但現在還有幾個人記得當時的著名宰相？可是韓愈、蘇軾、朱熹的名聲卻千古流傳。在多數的情況下，治學與舉業不可偏廢，書院大師並不反對弟子應舉入仕，但一再教導學生要講求學術，良有以也。

「書院所以育成材，義學乃以端蒙養。」書院培養的是高於蒙學程度的經世致用人才，一般也就不會與科舉對立。實際

上，若我們看待科學也不再像從前對待書院那樣一味地否定，則承認書院兼重科學，並不會影響我們稱道書院文化。從現存各種書院志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書院都以培養出眾多的舉人進士為榮。越是著名的書院，其歷代院長由科舉出身的比例越高。清代一般大書院選聘山長時往往以科甲為首要條件，這就如現代大學師資要求有博士碩士學位一樣，因為科名就是古代的東方型的學位，是學問的硬指標和表徵，為人們所信服。而要想獲得進士或博士頭銜，非得有相當的心智和付出不可。

李兵於 2001 年考為我的博士研究生，之前出自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頗得湖湘學派之「真傳」。在學期間，十分勤勉，與我合作完成並出版了《中國科舉史》和《學優則仕：教育與科舉》二書，相當得力，可謂文思敏捷的博士弟子。考慮到他的學科背景和工作環境，並在「科舉學」中選題，很自然的就選定《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這一專題作為博士論文題目。經過奮力研究，李兵順利地完成了論文的寫作。該論文於 2004 年 6 月在廈門大學通過答辯，受到五位評審專家的高度評價，並被七位答辯委員會委員一致評為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出現近十年來本院博士論文答辯難得一見的全優評價。作者憑藉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和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工作的有利條件，對書院與科舉兩個方面都有較好的把握。在查閱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該文系統深入地論述了從唐代至清代書院與科舉的密切關係，澄清了過去一些是似而非的觀點，多有新見，達到較高的學術水準。論文注重實證研究，列有大量的關於書院的統計圖表，包括最後一章中對書院與科舉關係的相關性分析，皆頗具學術價值。現該文修改補充

成書出版，對「科舉學」研究和書院研究都有一定的貢獻。

學術研究的上佳之作應在考據、義理、辭章三方面都有優長。本書史料豐富翔實，側重考據，兼顧義理和辭章。如何將三者儘量發揮，更上層樓，值得作者在今後的著述中着意追求，故特提出與作者共勉。是爲序。

劉海峰

2004年11月22日

於廈門大學白城28號樓

目 次

| | |
|------------------------------|-------|
| 序..... | 劉海峰 i |
| 導言 | 1 |
| 壹、晚唐五代科舉制度演變與書院教育的萌芽..... | 9 |
| 一、引言 | 9 |
| 二、科舉制度與重詩賦風尚 | 10 |
| (一) 重明經——儒家經典成爲學習的主要內容 | 10 |
| (二) 進士科日重——學習文學成爲士人的選擇 | 11 |
| 三、讀書山林與進士及第 | 13 |
| 四、講學應舉與書院教育的萌芽 | 22 |
| 五、結論 | 30 |
| 貳、北宋前期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 31 |
| 一、引言 | 31 |
| 二、科舉改革——士人階層重新形成與擴大 | 32 |
| 三、官學發展滯後——士無求學之所 | 36 |
| 四、書院勃興——教化應舉之士 | 42 |
| 五、官學替代機構——書院與官學功能重合 | 50 |
| 六、結論 | 56 |
| 參、北宋中晚期文教改革和書院轉型..... | 57 |
| 一、引言 | 57 |

| | |
|--------------------------|-----------|
| 二、慶曆改革與書院發展 | 57 |
| (一) 范仲淹改革——以科舉促進官學發展 | 58 |
| (二) 官學的發展迫使書院轉型 | 60 |
| 三、學校科舉合流與書院發展 | 65 |
| (一) 王安石變法——養士與取士相結合的初步嘗試 | 66 |
| (二) 蔡京執政——養士與取士完全統一於官學 | 68 |
| (三) 兩次改革對北宋中後期書院發展的影響 | 70 |
| 四、新儒學教育與書院轉型 | 75 |
| (一) 文化話語權與政治話語權的分離 | 75 |
| (二) 講學書院以對抗政治話語權 | 78 |
| 五、結論 | 86 |
| 肆、南宋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 88 |
| 一、引言 | 88 |
| 二、南宋科舉恢復與官學發展 | 89 |
| (一) 科舉社會的形成——士人數量急增 | 89 |
| (二) 南宋初期官府無力興學 | 92 |
| (三) 議和之後朝廷興學 | 93 |
| 三、新儒學的傳播與書院發展 | 97 |
| (一) 頻繁禁學與書院發展 | 97 |
| (二) 「嘉定更化」與書院發展 | 103 |
| (三) 理宗之後——書院職能再次與官學趨向一致 | 106 |

| | |
|------------------------------------|------------|
| 四、以德業爲舉業的基礎——書院大師的科舉觀 | 112 |
| (一) 批評科舉取士並不等於反對科舉制度 | 112 |
| (二) 學習儒家經典——德業與舉業並重 | 117 |
| (三) 以科舉觀爲指導——改革科舉制度 | 120 |
| (四) 批評科舉的真正動因不是科舉腐敗 | 125 |
| (五) 南宋進士與書院發展 | 128 |
| (六) 南宋末期——書院的科舉教學 | 134 |
| 五、結論 | 136 |
| 伍、元代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 138 |
| 一、引言 | 138 |
| 二、書院教育與程朱之學的傳播 | 138 |
| (一) 講學書院——宣講程朱之學 | 139 |
| (二) 依托書院——程朱之學北傳 | 142 |
| 三、書院與科舉制度的恢復 | 154 |
| (一) 書院——恢復科舉的主導力量 | 155 |
| (二) 書院講學者——程朱之學科舉化的推動力量 | 158 |
| 四、官學化——書院爲科舉服務成爲必然 | 161 |
| (一) 官學化——爲科舉服務的具體表現 | 162 |
| (二) 書院教學科舉化的理論基礎——《程氏家塾 讀書分年日程》 | 169 |
| 五、結論 | 178 |

| | |
|--------------------------------|-----|
| 陸、明代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 179 |
| 一、引言 | 179 |
| 二、明初：科舉必由學校——書院沉寂 | 179 |
| 三、明中後期：書院發展的契機——培養科舉人才 | 186 |
| (一) 科舉弊端逐漸顯露 | 187 |
| (二) 各級官學的科舉教學功能式微 | 188 |
| (三) 書院發展的動力——培養科舉人才 | 192 |
| 四、講會書院——講學與舉業非分二事 | 205 |
| (一) 王湛之學以書院為研習、傳播基地 | 206 |
| (二) 王學信奉者的科舉觀——講學與舉業統一 | 209 |
| 五、結論 | 219 |
| 柒、清代考課式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 221 |
| 一、引言 | 221 |
| 二、書院取代官學成為科舉教育的主要機構 | 222 |
| (一) 籠絡與壓制並用——躋身科甲成為士人無可奈何的必然選擇 | 222 |
| (二) 讀書應考風尚的強化——官學人數急劇增加 | 225 |
| (三) 考課為主要職能——官學形同虛設 | 228 |
| (四) 教授科舉之學——書院發展的必要性 | 230 |
| 三、創建或修復書院——以科舉為目標 | 234 |

| | |
|--------------------------------|------------|
| (一) 官立書院——奉行科舉教學旨意 | 235 |
| (二) 理學書院——科舉之學和程朱之學的統一 | 244 |
| (三) 民辦書院的創立或修復——培養子弟讀書應舉 | 250 |
| 四、書院完善學規與章程——以科舉為指向 | 253 |
| (一) 延聘山長——科甲出身為基本條件 | 253 |
| (二) 書院山長的科舉觀——應試與育才的統一 | 258 |
| (三) 甄別考試——選拔應舉生徒 | 267 |
| (四) 書院經費——為生徒應舉提供保障 | 274 |
| (五) 書院教學——以八股文寫作為核心 | 283 |
| (六) 自學指導——為生徒讀書應試服務 | 285 |
| (七) 書院考課——科舉考試的預演 | 291 |
| (八) 考課場所——書院科舉的物化象徵 | 296 |
| (九) 祭祀與風水——書院科舉的精神強化 | 300 |
| 五、結論 | 304 |
| 捌、清代漢學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 305 |
| 一、引言 | 305 |
| 二、十九世紀之前漢學書院教育與科舉 | 306 |
| (一) 漢學書院山長的條件——學術造詣？科甲出身 | 307 |
| (二) 漢學家執掌書院——發展學術？提高科舉及第 率？ | 314 |
| (三) 書院漢學教育與八股文寫作 | 320 |

| | |
|-------------------------------------|------------|
| (四) 漢學書院的科舉教學 | 326 |
| 三、 漢學專門書院教育與科舉 | 331 |
| (一) 詁經精舍、學海堂的反科舉傾向 | 331 |
| (二) 詁經精舍、學海堂的教學效果——漢學家和科 舉人才並蒂齊芳 | 337 |
| 四、 道光以後漢學書院教育與科舉 | 342 |
| (一) 科舉出身的地方官吏和學者擴大了漢學專門書 院的影響 | 342 |
| (二) 漢學書院兼課科舉之學 | 348 |
| (三) 考課式書院與漢學書院區別的模糊 | 353 |
| 五、 結論 | 356 |
| 玖、清末書院改制與科舉革廢關係研究 | 358 |
| 一、 引言 | 358 |
| 二、「淫心戮力於帖括」——書院必要性喪失 | 358 |
| (一) 聲音微弱——清代中葉以前消極不贊同書院 科舉 | 359 |
| (二) 眾矢之的——十九世紀末書院科舉 | 361 |
| 三、 變通書院與改革科舉 | 363 |
| 四、 科舉停罷和書院改制 | 374 |
| 五、 結論 | 385 |
| 拾、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的相關性分析 | 387 |

導 言

一、研究緣起

書院是唐末五代出現的一種獨特的教育組織，它既非官學亦非私學，但在不同時期又不同程度地承擔了官學的職能，成爲宋代士人求學、研究學術的主要場所。進士科舉於隋大業元年（605）產生以後，隨着其選拔人才功能的日漸顯露，逐漸成爲士人的主要仕進之途，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因之而成爲典型的科舉社會，書院與科舉在中國古代教育大舞臺上共存了1000餘年。宋代以後，書院逐漸承擔了養士的主要職責，而科舉制度則成爲了主要文官選拔制度，二者共同影響着中國古代士人的前途與命運。至清末，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淫威面前，腐朽的科舉制度與現實的人才需求之間的矛盾便日漸尖銳，尋求擺脫民族危亡的改革者將書院改制和廢止科舉制度視爲救亡圖存的主要途徑，制度層面的古代書院和科舉取士制度幾乎同時在中國古代教育歷史上消失。¹

拙著所涉及的書院只是從晚唐五代肇始的作爲教育組織的機構，而基本不涉及作爲藏書、祭祀功能而存在的書院；科

¹ 書院改學堂是爲培養新式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但1000餘年以來形成的書院的優秀傳統也被徹底拋棄，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損失，正如胡適先生所言：「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誌》第21卷第3期）同樣，科舉制度的廢止也有其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但不少有識之士對於科舉制度的合理性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詳細論述請參閱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六章第三節。

舉制度也只是以隋代開始的進士科舉為研究對象，而非廣義的科舉制度。

對書院與科舉之間關係的研究前人已有涉足，早在上世紀的 20、30 年代，就有研究者提出了「宋代書院反科舉」的論斷，這一觀點為不少研究者認同。然而，當我們閱讀文獻時，卻常常會看到與之矛盾的文獻，從宋代開始就有多所書院直接開展科舉教學，不少書院大師亦是贊同和鼓勵生徒應舉，這些歷史事實與書院反對科舉的觀點存在着明顯的扞格。與此同時，至上世紀 90 年代，不少學者也對這一觀點提出了質疑，即書院不可能反對科舉取士制度，並且認為二者是相互關聯的。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持這兩種觀點的研究者都未對書院與科舉關係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更沒有通過實證研究直觀地說明二者之間的關係。可見，對書院與科舉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研究，不僅能從學理上全面梳理書院與科舉關係 1000 餘年發展歷程的大致脈絡，而且能厘清書院與科舉之間複雜關係，使我們能更深刻地掌握中國古代書院發展起落的內在原因。

二、研究文獻綜述

拙著將研究重點置於書院與科舉二者之間的關係之上，而對於起支撐作用的書院發展史和科舉制度史則是借鑒前人和本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筆者將研究書院與科舉關係文獻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其一，截止 2003 年，筆者能見的到對書院與科舉關係進行提綱式論述的論文有三篇：向群的〈簡論中國古代書院與科舉的關係〉（嶽麓書院編輯《書院研究》，1988 年）以嶽麓書院為例，分析了宋代書院在教學內容、制度等方面與科舉制度的

關係之後，否定了「書院前期自由講學，經世致用色彩濃厚，與科舉沒有什麼聯繫」的論斷，指出：「即或在書院發展的前期，書院亦沒有脫離科舉而獨立存在。」王興國的〈略論古代科舉制度對書院之影響〉（嶽麓書院編輯《書院研究》，1989年）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分析了科舉制度對書院影響的過程及其內容，並得出了科舉制度不僅逐步影響和改變了書院的性質，而且必然影響到書院的各項具體制度。劉海峰在〈論書院與科舉關係〉（《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一文中，更是直接指出了書院與科舉之間的密切關聯，指出書院不可能反對科舉制度。由於篇幅所限，後兩篇論文雖然沒有進行細緻入微的論述，但其觀點對於本研究思路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筆者尚未發現臺灣和國外專題研究書院與科舉關係的成果。

其二，不少書院史和教育專著對於書院與科舉關係的問題有所涉及。研究者對於宋代書院與科舉關係的觀點分歧比較大，陳東原著《中國教育史》（1936年）的觀點十分具有代表性，在分析了朱熹所作白鹿洞書院之詩句後，指出：「朱子對白鹿洞諸生的希望，完全是靜靜的求學，莫問世事，莫羨騰騫。完全是反科舉的。」分析陸九淵的〈白鹿洞講義〉時，該書再次強調：「這種反科舉的精神，是朱子興復白鹿洞書院的特點。」

臺灣學者孫彥民所著《宋代書院制度研究》（1963年）承續了這一思想：「中國科舉制度，創始於隋唐，完備於兩宋。自是而後，士子讀書均以獵取功名為目的。……迨安定、泰山首開講座，……其後凡欲正人心，明道學之儒者，往往於山水之勝處修書舍以授生徒，書院之製成矣。翻閱宋人典籍，處處可見反科舉精神。」

賈志揚的《宋代科舉》（1980年）一書在統計了宋代書院參考數之後，提出「到南宋中期，科舉和書院對讀書人提出了

顯然互相矛盾的兩種選擇。前者有使人獲得聲望和權力的希望，但被批評為在道德上和社會上有腐蝕性；後者雖有道德培養和理性探究的綱領，但被批評為在其提倡中，特別是在那些自稱唯一懂得王道的人中助長了高傲氣焰。」並認為有兩種因素使得由士人所控制的書院無法代替政府所控制的科舉（及學校），這兩種因素是：首先，書院「對科舉生活的反對實際上是有限的；對科舉所加於教育和社會的影響的批評很少擴大到非難科舉本身，人們承認科舉是必要的」；其次，「政府力圖把書院吸收為官方團體」。他認為，儘管這兩種因素使得書院與科舉之間的矛盾趨向緩和，「卻未消失，因為對科舉所造成的教育方法的不滿和新儒學家們對這種不滿的反響仍然存在。」儘管賈志揚的研究是針對宋代的，但這一研究結果為筆者提供了宏觀思考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的思路。

吳萬居的《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1991年）則認為「宋代書院之盛，實為科舉制度之反響。」但上引的三篇專門論述書院與科舉關係的論文都認為宋代書院與科舉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宋代書院不可能反對科舉。琳達·沃爾特在〈南宋書院的地理分佈〉（《湖南大學學報（社會學科版）》，1993年）一文更是指出：「在科舉制度下，以考取進士很多而聞名的地方，多是那些書院雲集的地方。」「研究的結果顯示，某些有助於書院發展的因素，同樣也是科考成功的原因。」

對於元代書院與科舉的關係，徐梓在《元代書院研究》（2000年）一書中稍有涉及，他認為：「在以宗黨書院為主要類型的元代，某地的書院數量多，也就預示着這個地區的讀書人多，士子多，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科考成功的比率就大。支撐書院存在的，與構成科考成功率基礎的是同一個東西，這就是一個相當規模的學術群體的存在。」

關於明清時期書院與科舉之間的關係，研究成果相對比較